

文廷式的革職與脫險

「讀人閱史」之十一

蔡登山 ◎ 文字工作者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2月17日，文廷式為御史楊崇伊所參，光緒帝下令：「著即革職，永不敘用，並驅逐回籍，不准在京逗留。」文廷式以博學強識，掇巍科，光緒十六年庚寅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二名及第，授職編修，擢侍讀學士。文廷式是光緒帝一直大力拔擢的人，卻在此時中箭落馬被罷黜，當時朝野皆為之譁然。其罷黜的原因據皇帝的聖旨說：「據稱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遇事生風，常於松筠庵廣集同類，互相標榜，議論時政，聯名執奏。並有與太監文姓結為兄弟情事等語。文廷式與內監往來，雖無實據，事出有因，且該員於每次召見時，語多狂妄。其平時不知謹慎，已可概見。」但這只是個託詞，其實並未道出真正的原因。黃秋岳在《花隨人聖齋摭憶》書中說：「文以新進勾結妃侍，獲得高科，取非其道，又處帝后猜忌之際，其取禍被謗，宜也。」或許更接近事實的真相。

文廷式以曾教珍妃姊妹讀書而著名於後世，也為世人所艷稱。其實他教珍妃姊妹讀書，是早在她們尚未被選入宮時。當時文廷式在廣州讀書時，因文名藉甚，與于式枚並推為陳蘭甫（澧）的高足。當時滿州人長善（樂初）正在做廣州將軍，最喜與文士交遊，文廷式亦被延之入幕，待以殊禮。與長善的姪子志銳（長敬之子，因長善無子女，故過繼給他。）、志鈞（長敬之子）亦有深交。珍妃的父親長敘，是長善的三弟。因此胡思敬撰〈文廷式傳〉時，說文廷式是在長善幕府時，教瑾二妃讀書，此說不確。因為文廷式入長善幕府始於光緒三年，約有三年之久，光緒三、四年時，瑾妃才四、五歲，珍妃才二、三歲，安有授讀之理。加上當時二妃之父長敘在京為官，並非流離失所，也不可能將此二弱女寄養於嶺外的廣州。所以教瑾二妃讀書之事，當在光緒十二至十四年間，當時文廷式常在北京，他在京時，常住在好友志銳家中，而其時長敘早已故世，瑾妃、珍妃就在堂兄志銳的安排下，搬進長善在北京的府第。時珍妃已十一、二歲，瑾妃亦十三、四歲，她們跟文廷式讀一些書，也是情理中的事。

瑾妃、珍妃姊妹為同父異母，在家族中瑾妃排行第四、珍妃排行第五。光緒十四年（1888年）10月初五，慈禧太后為光緒帝選后，慈禧以其弟弟吉祥的女兒，也就是光緒帝的表姐為隆裕皇后，瑾妃和妹妹珍妃同時入選，成為光緒帝的妃子，之後個別以瑾嬪和珍嬪的身分入宮，以後又被晉封為妃。慈禧選擇自己的侄女為后，主要是監視皇帝的行動。但在選后時，光緒帝



原本看中的是別人，只是由於慈禧太后的干預，才選了隆裕。但他從沒想到從小在一起玩的表姐弟，會被慈禧太后指定為夫妻，他特別接受不了。光緒帝的個性特別執拗，此後他就偏寵珍妃，與隆裕皇后感情日漸交惡，實肇端於此。而當珍妃日漸得寵之際，因見光緒帝雖已親政，然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於慈禧之手，為了幫助皇帝力振乾綱，乃極力舉薦她的蒙師文廷式。

光緒十六年4月21日，文廷式赴殿試。24日，殿試讀卷進呈御覽，翁同龢等彌封奏至廷式之名，光緒帝宣詔曰：「此人有名，作得好！」於是欽定文廷式殿試一甲第二名。光緒帝如何知道文廷式有名呢？如非珍妃屢有所言，當無印象如此之深也。到了光緒二十年3月，文廷式參加保和殿翰詹大考。未閱卷前，光緒帝特提朱筆御寫「文廷式一等」五個字交下閱卷房後，皇帝兩次傳下口諭：「除第一及另束五本毋動外，餘皆可動。」4月初八，大考榜發，文廷式得第一第一名，並著以侍讀學士升用。文廷式再度因珍妃的關係而被拔擢，因此當時人諷刺說：「玉皇大帝召試十二生肖，兔子當首選，月裡嫦娥為通關節」，形容得極為刻薄。

珍妃的得寵，自然招致了疑心極重的慈禧太后的的大忌。而賣官鬻爵的不法勾當，更引起了慈禧的強烈不滿。清朝制度，妃子例銀（工資）每年300兩，嬪為200兩。珍妃用度不足，又不曾節省，還對宮中太監時有賞賜，虧空日甚。她遂串通太監，效仿慈禧的行為多次受賄賣官。因為有利可圖，當時太監中最有勢力的數人均染指其中。胡思敬的《國聞備乘》記載：「魯伯陽進四萬金於珍妃，珍妃言於德宗，遂簡放上海道」。魯伯陽上任一個月後被江督劉坤一彈劾罷免。對此慈禧曾當面拷問珍妃，並從其住處搜獲記有其賣官收入的一本帳本。但珍妃卻反唇相譏，「祖宗家法亦自有壞之在先者，妾何敢爾？此太后主教也。」。因此光緒二十年10月28日珍妃遭到了「褫衣廷杖」（剝去衣服，由太監用竹板重打袒裸的臀部）的懲罰。也有論者以為此事與當時「議和」之事有關，瑾、珍二妃是積極支持光緒帝對日抵抗的，據胡思敬的《國聞備乘》記載：「東事起，咸言起兵。是時鴻章為北洋大臣……不敢開邊隙……於是文廷式等結志銳密通宮闈，使珍妃進言於上。」

對此，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說：「同時，將瑾妃、珍妃革去妃號，褫衣廷杖。妃、嬪而受廷杖，刑罰之慘，本朝所未聞也。」10月29日翁同龢於日記記道：「皇太后召見樞臣於儀鸞殿，先問旅順事，次及宮闈事，謂瑾、珍二妃有祈請干預種種劣跡，即著繕旨降為貴人等因。臣等再三請緩辦，聖意不謂然。」接著光緒帝奉慈禧皇太后懿旨，將瑾妃、珍妃著降為貴人（第七等），「以示薄懲」。珍妃被幽閉於宮西二長街百子門內牢院（也就是常說的「冷宮」），與光緒帝隔絕，不能見面。

其實，光緒二十年珍妃獲罪的最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與光緒帝之間的權力鬥爭。慈禧太后為打擊漸趨形成的帝黨集團，首先拿光緒帝最寵愛的珍妃開刀，對珍妃的一系列懲罰，尤其「褫衣廷杖」，遭受疼痛和羞辱的是珍妃，顏面盡失的卻是光緒帝。而緊接著牽連剝奪了帝黨主要成員志銳、文廷式的權力，據《清史記事本末》說：「並謫妃兄志銳於烏里雅蘇臺。文廷

式以託病出京，僅免於罪。」，帝黨集團受到致命打擊。在志銳前往蒙古赴任時，文廷式還寫了詞〈八聲甘州——送志伯愚侍郎赴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之任〉，為他送行。同年11月初二翁同龢於日記記道：「午正二刻入見於儀鸞殿，……次及言者雜遝，如昨論孫某，語涉狂誕，事定當將此輩整頓。」其中「昨論孫某，語涉狂誕」，蓋指文廷式彈劾孫毓汶之事。顯然是慈禧太后看到朝中支持皇帝主戰，公然彈劾軍機大臣孫毓汶、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文人士大夫宛然已成勢力，連皇帝也大有主張，這使得她必須先下斷然措施，剪除皇帝的羽翼。因此對文廷式彈劾孫毓汶一折，斥為「語涉狂誕」，聲稱「事定當將此輩整頓」。

黃秋岳認為文廷式後來被逐是宮廷政爭所引起的，他在《花隨人聖盦摭憶》書中引某筆記載：「德宗愍直，上書房總師傅翁同龢亦頻以民間疾苦外交之事誘勉德宗。德宗常言，我不能為亡國之君，語侵慈禧，而廢立之說興焉。時坤宮與德宗弗睦，頻以讒間達慈禧，故事機益迫。甲午清兵潰，軍艦被擄，吳大澂魏光燾督師關外，劉坤一督師關內，李鴻章議約多損失，幾定約焉。翰林學士文廷式，習聞宮中諸事，知內憂外患交乘，國將覆，往見坤一，請力爭約款。坤一未會意，謂弱國無權利可言。廷式請攝左右，以廢立之說相告。且謂宮中蓄謀久，榮祿以疆臣督兵將不應恫之。慈禧有所作，每詢疆臣等意思若何？是宮中滋忌疆臣，疆臣資高負宿望者今惟君。某知爭約必不成，俾內廷因斷斷爭約，知廢立之難實行，則曲突徙薪之效見焉。坤一屬廷式代起草，而廢立之謀以止。」文廷式也明知爭取對日和約之緩期交換，是不可為之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想藉著爭約一事，來表示疆臣對國政的關心，一旦國家有大事發生，疆臣絕不會袖手旁觀的。如此一來使得慈禧太后對廢立之說，能夠知難而退，免政爭於「未雨綢繆」也。黃秋岳也認為文廷式這主意立意良善，但同時也破壞了慈禧廢立之大計，他說：「據此，道希為德宗謀不為不忠，從權應變不為不智，西后必欲去之，已躍然愈急。」

在中日戰爭爆發後，文廷式與李鴻章由於雙方立場的不同，以致兩人關係急遽惡化。其間，李鴻章雖難辭其咎，但文廷式也未免攻訐太過，李鴻章自然會對文廷式有所積怨。尤其是光緒二十年8月，黃海大敗，李鴻章一生英名毀之殆盡。在帝黨和言官的交章彈劾下，被褫去了三眼花翎及黃馬褂，這對一生戰功彪炳的李鴻章而言，無疑是奇恥大辱。因此他後來不無感慨地說：「予少年科第，壯年戎馬，晚年洋務，一路扶搖，遭遇不謂不幸。自問亦未有何等隕越，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生平名節，被後生輩描畫都盡。』環境所迫，無可如何？」他言下之意，對帝黨人物的清議，始終是耿耿於懷的。而文廷式是當時清議的領袖，李鴻章對其更是厭惡至極。只是他找不出文廷式有任何重大違誤，因此一時間只得隱忍。

光緒二十一年6月，文廷式出都南歸時，據顧家相《五餘讀書塵隨筆》記載：「芸閣主眷日隆，名震中外，嘗指陳時事，擬成奏稿七篇，置枕箱中，其語頗有侵合肥者。道出上海，箱忽被竊，時黃愛崇觀察承寧，方官上海令，為之追還原物，纖細畢具，而奏稿竟不可得，蓋早入



合肥之手矣。」枕箱追回，僅奏稿遺失，李鴻章唆使人爲之，嫌疑最大。李鴻章取得彈劾他的奏稿，更加速對文廷式的報復行動。於是才有光緒二十二年2月中旬的楊崇伊彈劾文廷式遇事生風並與太監結爲兄弟之事。

楊崇伊字莘伯，江蘇常熟人，光緒六年庚辰進士，以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熬了多年翰林清苦，沒有什麼出路，於是以翰林資格考取御史。他就任御史後第一疏即是在光緒廿一年（1895年）11月首劾康有爲、梁啟超在北京所創設的強學會，結果奉旨查禁。楊崇伊的目的在討好在朝的頑固派執政王公大臣，他身處擁后、擁帝的兩派鬥爭中，他爲了日後的飛黃騰達，他選中了后黨的集團，積極地爲后黨出賣力氣，表現身手。楊崇伊跟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實爲李鴻章六弟李昭慶之子，後過繼給李鴻章）是兒女親家，楊崇伊的兒子楊雲史娶李鴻章的孫女、李經方的女兒李國香（道清）爲妻。而李鴻章的孫子李國杰則是楊崇伊的女婿。因此楊崇伊爲李鴻章出手彈劾文廷式，則自然不過的事。

又據〈汪大燮致汪康年書〉所云：「又正月十三停毓慶宮。十四，楊崇伊爲合肥訪查臺館彈劾東事之人，開一清單，凡三十餘人。十五、六，合肥又獨詣長信呈之。十八，楊即以彈芸閣章就正合肥。合肥臨行有言：『若輩與我過不去，我歸，自他們尚做得成官否？』至津又告人云：『劾我諸人，皆不妥矣。』其卅餘人之單，德使署有之，大約各署皆有，惟見其單者，固由德使給閱也。」又張孝若所著《張謇年譜》光緒二十二年條下亦載：「李相使俄，慈禧太后召見。李摺呈五十七人禁用，首文廷式。李出京，御史楊崇伊劾廷式，罷遣。」因此李鴻章挾私怨報復文廷式，授意楊崇伊彈劾，則已昭然若揭。

當然首先是文廷式自己捲入宮廷內鬥中，他屬於「帝黨」以翁同龢爲首領的所謂「後清流」的一員幹將，也是慈禧太后想要除之而後快的目標。文廷式的被革職驅逐出京一事，當是慈禧太后親下的懿旨，若非慈禧下令，以光緒帝對他的寵信，必定徇情迴護，而楊崇伊之彈劾，則亦當難以得逞。被革職的文廷式出都南歸，經上海，過金陵，至漢口，轉長沙（按：王闓運《湘綺樓日記》說8月7日文廷式已到長沙），返回故里江西萍鄉。

光緒二十四年早春的北京城，維新變法正處於積極醞釀之中，光緒皇帝召見康有爲等維新人士，徵詢國是。6月11日（舊曆4月23日）下詔，宣布變法。帝黨與后黨、維新派與頑固派進入短兵相接的階段。這期間輾轉於湘贛兩地的文廷式，深切關注京城政局，既感世事非變法不可，爲光緒帝推行維新之舉而欣欣然，又深慮慈禧太后的心狠手辣，擔心變法受阻，難成氣候而憂憂然。9月21日（舊曆8月初六），慈禧發動政變，百日維新告終。光緒帝被囚禁中南海瀛台。兵圍康有爲住地，康有爲逃往上海，遺下的信札有文廷式給他的長信洋洋數千言。9月25日（舊曆8月初十），上諭密電兩江總督劉坤一及署理江西巡撫翁曾桂「密飭訪拿」文廷式，押解來京。對此陳寅恪的侄女陳小從在〈庭聞憶述〉也說：「戊戌八月（按：指舊曆）政變，慈禧復出奪權，對已革翰林侍讀學士文廷式猶有餘憾，必欲置之死地。嘗降密旨謂：『無論行至何

處，著即就地正法。」」

在風聲鶴唳的緝拿行動中，文廷式卻杳如黃鶴，不見蹤影。於是後人都認為文廷式避走日本，直至湯志鈞撰寫《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及其修訂本時，仍然說：「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政變作，廷式慮禍及，乃走日本。」其他各類近代史辭書和著作，凡涉及文廷式脫險一節者，幾乎一律沿用了這種說法。但根據文廷式的《東遊日記》的記載，他去日本是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的事。在光緒二十五年歲末他自家鄉出門，沿著長江出海在長崎進入日本國境，後至神戶路過馬關——文廷式以其對中國為羞恥地，故未停留，徑經大阪、京都。當他到神戶時，即有友人中西正樹由東京到神戶來接他。1900年1月18日（新曆2月17日）他到達東京。而據當時（1899年9月至11月）作為《萬朝報》的主筆身份遊歷中國的日人內藤虎次郎（內藤湖南），在遊歷華南華北期間，他通過面會筆談，結交了嚴復、文廷式、張元濟、羅振玉等，後來並出版《燕山楚水》一書，在其中〈禹域鴻爪記〉一文記載，他在1899年在上海與文廷式第一次訪談的內容，是其時文廷式還在上海，而還沒到日本。依此觀之說戊戌政變後，文廷式為避禍而遠走日本，是不確的。

那當時文廷式又藏身何處呢？據學者張求會在〈文廷式戊戌脫險研究綜論〉一文的考證是：戊戌八月初十，上諭密電訪拿文廷式，押解歸京。文廷式在湖南巡撫陳寶箴及其長子陳三立等人的幫助下，自長沙出逃至湘潭一粟河唐氏家中避難。而在陳寅恪遺作〈寒柳堂記夢未定稿（補）〉中也說：「戊戌政變未發，即先祖、先君尚未革職以前之短時間，軍機處廷寄兩江總督，謂文氏當在上海一帶，又寄江西巡撫，謂文氏或在江西原籍萍鄉，迅速拿解來京。其實文氏既不在上海，又不在江西，而與其夫人同寓長沙。先君既探知密旨，以三百金贈文氏，囑其速赴上海。而先祖發令，命長沙縣緝捕。長沙縣至其家，不見蹤跡。復以為文氏在妓院宴席，遂圍妓院搜索之，亦不獲。」文廷式與陳家同籍兼世交，陳寶箴及陳三立父子自然會加以營救。陳小從在〈庭聞憶述〉對此事亦加以補充說：「當時文廷式正隱藏長沙某處，密旨抵撫署，右銘公（按：陳寶箴）壓下未發，先祖（按：陳三立）密遣心腹，攜銀至文住處，勸其速逃。當時適有文之同里某候補知縣，來撫署告密，並言：如去捉欽犯，彼可帶路。先祖佯與應付，估計文已脫險，始虛張聲勢，派人扮演了一場捉拿欽犯的鬧劇。」至於從長沙逃至何處，在文廷式的手稿〈擷芳錄〉的後跋云：「戊戌八月，寓湘潭一粟河唐氏家。」

之後的行蹤又如何？根據當時日本駐上海代理總領事小田切萬壽曾有一專函給日本的外務次官，函中提到「……由於該人之存亡，事關將來清國之氣運，故小官試圖運用智謀，以將其從當地救出。或者該人由湖南隱身之處派出密使，或者發出密電，委託於小官，在做出種種考慮後，又密囑旅居漢口的東肥洋行主任緒方二三，籌劃救助該人之策。聯絡中出現誤差，該人與其弟廷楷突然來到漢口。於是，緒方根據小官內囑的意見，使其更換服裝，登上大阪商船會社輪船天龍川丸，並特派人員加以保護。途中平安無事，於十九日抵達當地。」而據文廷式的



〈冒淑人墓志〉文中云：「當余爲世所厄，則毅然排眾議，偕述庭兄送余至滬上」，是當時護送文廷式到上海的是他的族兄文煒（述庭）和族嫂冒氏夫婦。而非小田切萬壽所說的文廷式的弟弟廷楷。

文廷式在1898年冬，以東行日本之計劃未獲日本官方允許，遂留在上海。據小田切萬壽函說：「該人最初的考慮是，平安逃脫後，立即來我國漫遊，但眼下急進黨失敗者康有爲在我國，該人一派與康多少有過反目的歷史，不願意與康同時旅居我國。否則，將加深北京政府的疑心，或懷疑該人與康黨暗通，而魚目混珠則難以區分。如此一來，對該人將來非常不利。眼下，暫觀察形勢以相機勸告其漫遊我國。」後來文廷式直到一年多以後的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才在日人保護下去了日本。同年3月（新曆4月）返回上海。

文廷式訪日，內藤與他兩人屢屢晤面，這在文廷式的《東遊日記》多所記載。內藤還將那珂通世、白鳥庫吉、桑原鷺藏等人介紹給文廷式。而文廷式鈔寫給予內藤的《蒙文元朝秘史》，後來促使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的完成，而此一成果再影響屠寄《蒙兀兒史記》的完成。日本學界認爲這對締造日本東洋史學之業績上，大有貢獻。這也是內藤與文廷式展現於中日文化交流的學術成果之一。1899年是內藤與中國學者交往的開始，在內藤這次結交的中國友人中，與文廷式一見如故，此後五年間最稱莫逆。1904年8月，文廷式不幸早逝，內藤還撰有〈哭文芸閣〉以寄哀慟。

文廷式晚年雖窮困潦倒但所爲詩詞，輒多忠愛纏綿盪氣迴腸之作。如〈病中口占南鄉子〉一闕：「一室病維摩，且喜閒庭掩雀羅，煮藥繙書渾有味，呵呵，老子無愁世則那！莽莽舊山河，誰向新亭淚點多？惟有鷓鴣聲解道：哥哥，行不得時可奈何？」沉哀幽怨，一代風華，與恨俱盡。遺著有《雲起軒詞鈔》及《純常子枝語》。

延伸閱讀

- （清）文廷式撰；趙鐵寒編（1969）。文廷式全集。臺北市：大華印書館。
- 錢仲聯撰（1969）。文廷式年譜。臺北市：大華印書館。